

[文章编号] 1009-3729(2013)03-0044-04

张载《东铭》思想探析

刘兆玉¹, 魏涛²

(1. 陕西师范大学 政治经济学院, 陕西 西安 710062;

2. 郑州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, 河南 郑州 450001)

[摘要]《东铭》与《西铭》同出一时,处境却截然相反,《西铭》大受追捧,而《东铭》却鲜有人问津。《东铭》意蕴虽不及《西铭》广阔宏大,但其所言之“言”、“动”确是为学修养工夫的切实下手处,学者只有在一言一行中仔细琢磨,明确分辨并省察、改过有心之故与无心之误,才可以于进学成圣处渐入佳境,浑然与天地同体。《东铭》所讲之“言”、“动”与张载的修养工夫论紧密相关,认为应于“言”、“动”小处下工夫,抛弃闻见小知之累,正心诚意,以实现“诚明所知”的圣人境界。这一思想还与《西铭》所言之天道思想相合,充分体现了张载哲学重礼、重实的学术特质,是心学之精言,值得学者重视。

[关键词] 东铭;戏言戏动;过言过动;工夫论

[中图分类号] B244.4 **[文献标志码]** A **[DOI]** 10.3969/j.issn.1009-3729.2013.03.009

《东铭》原名《砭愚》,是北宋关学创始人张载(1020—1077年)的代表性著作之一,与《西铭》(原名《订顽》)共置于《正蒙·乾称篇》。张载曾将二铭录于学堂双牖左右,以警示学者。《西铭》因其“意极完备”、“极醇无杂”,极好地阐发了儒学大意而备受学者关注。在两宋佛道鼎盛、儒门渐颓的情势下,《西铭》的出现维护了儒学的学统、尊严,成为儒学经典篇目,对后世学者影响极大,为其作注、作解者甚多。而《东铭》所受关注远不比《西铭》,在《正蒙合校集释》所辑的《西铭、东铭及历代西铭注、东铭注序跋书目提要》中,《西铭》及其注解的序跋有21篇,《东铭》及其序跋仅有2篇,即《冉觐祖东铭附训序》和《沈自彰张子二铭题辞》,后者还用大段篇幅赞《西铭》之广大精蕴,仅在文末提及“《东铭》严毅,一时并出,兹用提掣,以示学者”^{[1](P1003)}。究其原因,不仅是《东铭》之气象不及《西铭》广阔、宏大,还应当归因于程、朱对《东铭》的忽略。然《东铭》所言自有其精妙之处,今之论者亦多忽视。因而,对《东

铭》的真实意蕴很有深入探讨的必要。本文拟从文本意涵、工夫论、历史地位三个方面来考察《东铭》的相关内容,以发掘张子之本意、探究《东铭》之特质。

一、对《东铭》的文本分析

《西铭》与《东铭》分置《正蒙·乾称篇》首尾,“乾称”二字出于篇首《西铭》首句“乾称父,坤称母”,由此句至“没,吾宁也”为《西铭》。《东铭》作为尾章,不过寥寥百余字:

戏言出于思也,戏动作于谋也。发乎声,见乎四支,谓非己心,不明也;欲人无己疑,不能也。过言非心也,过动非诚也。失于声,缪迷其四体,谓己当然,自诬也;欲他人己从,诬人也。或者以出于心者归咎为己戏,失于思者自诬为己诚,不知戒其出汝者,归咎其不出汝者,长傲且遂非,不知孰甚焉!

此章所言皆在“言”、“动”二字,熊刚大注本《性理群书句解》:“此篇论戏言、戏动与过言、过动之不

[收稿日期] 2013-01-13

[基金项目] 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(10C025)

[作者简介] 刘兆玉(1989—),女,河南省洛阳市人,陕西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,主要研究方向:宋明理学;魏涛(1978—),男,陕西省西安市人,郑州大学讲师,博士,主要研究方向:张载关学与宋明理学。

同。”^{[1](P66)}现将此章分为三小节,自“戏言”至“不能也”为一节,自“过言非心”至“诬人也”为又一节,其后为一节。详释其要,以揣合张子《东铭》之本意。

“戏言出于思也,戏动作于谋也。发乎声,见乎四支,谓非己心,不明也;欲人无己疑,不能也。”何谓“戏言”、“戏动”?冉觐祖曰:“戏言,谓戏谑之言;戏动,是嘻戏之动。”^{[2](P963)}二者皆纵心于游佚,任一时之适,语轻薄之言,行不当之事,如此则心失于诚敬,言行失于厚重,不见端方君子之态。若仅将轻浮不当的言行归咎于“戏”,认为本心并非如此而不加修正,长此以往,必流于“长傲”。

“过言非心也,过动非诚也。失于声,缪迷其四体,谓己当然,自诬也;欲他人己从,诬人也。”此句讲“过言”、“过动”。《礼记·哀公问》亦讲“过言”、“过动”:“公曰:‘敢问何谓敬身?’孔子对曰:‘君子过言则民作辞,过动则民作则。君子言不过辞,动不过则,百姓不命而敬恭,如是则能敬其身。能敬其身则能成其亲矣。’”^{[2](P965)}即是说君子言行得当、言行皆依其礼,不过而有则,便能成敬其身、成就其亲。张载认为,“过言”、“过动”皆是无心之失,不能代表其心之本然。心之本意向善,然受闻见小知影响,不加判断而出现了错误的言行,虽非有意为之,仍不能掩其失误,即王夫之《张子正蒙注》“非物理之应得,任闻见之小辨以言动,虽始非不善而终成乎恶,谓之过”。“过言”、“过动”出于仓促思虑,未加斟酌辨别,是一时“失于声,缪迷其四体”,虽为一时之失,但仍需改之。如果将当改之过错看做心本是如此,则是文过饰非、自诬本心,如此就会由一时疏忽不察引起的“过”发展成“恶”,更不用说妄图使他人顺从己意、诬枉他人之心了,这即是“遂非”。王夫之《张子正蒙注》中所说“始亦有意于善,而过则终成乎恶矣。不存诚精义以求至当,自恃其初心之近道自诬,则未有能强人者也。王介甫之所以怙过而取之于天下也”,即是此意。

“或者以出于心者归咎为己戏,失于思者自诬为己诚,不知戒其出汝者,归咎其不出汝者,长傲且遂非,不知孰甚焉!”将本出于心的戏谑仅仅看做言辞、行为上的错误,将一时之不察反诬为本心之不良,这是学者为学的两大弊病。归咎己戏而不知戒则长其傲,自诬本心而失其思则遂其非。“‘长傲’直承‘不知戒’,‘遂非’直承不知‘归咎’。戏多不恭,故贴傲;过则有失,故贴非”^{[2](P965)}。熊刚大说:“不知警戒其出汝心而为故者,乃归咎责其不出汝心而偶失者,咎己戏则增长敖诞,而慢愈滋矣。诬己

诚则遂从非失,而过不改矣。不知而愚,莫此为甚!”^{[2](P964)}冉觐祖认为,上两节(指的是“戏言”至“不能也”和“过言”至“诬人也”)讲论的是工夫失误之处,是“论其理”,而该小节则是说学者应当于这两处切实下工夫,居敬穷理以砭其愚,“方指其人”。^{[2](P963)}

《东铭》主旨论“戏”与“过”,沈毅斋^[3]详述朱子与江西学者说此篇之大旨,不越乎“故”、“误”二字。有心谗浪,由心发、出于汝是“戏”;无心之差,失于思、不出于汝是“过”,为学者要明确二者之差异。若是“出于思”之“戏”,需谨言慎行于心之未发之前,主敬持重,正心诚意;若是“失于思”之“误”,需察言观动于心之已发之后,迁善改过,循理徙义。做到这两点并将其扩充到极致,便可以穷神知化,为仁人、为孝子,尽心知性以事天,于进学成圣处渐入佳境,浑然与天地同体。可见砭其愚则智,由智可以求仁,克治出于心之“故”与失于心之“误”是学者求仁的切实下手处,虽微但不乏其要,是心学之精言。

二、《东铭》与张载工夫论

《东铭》既然与《西铭》同置于学堂作警示学者之用,可见不论后人对二铭的意蕴如何阐发,张载之本意都在于督促学者进学。张载论学的最终目的即是使学者由学至明,再由明而诚,最后成为“从容中道”之圣人。因此,对《东铭》真实意味的探讨不能不联系到张载主张的为学之道,此道不仅与学相关,更与德相关;不仅要明,更要诚,这也是儒家所提倡的仁智合一、诚明合一、为学进路与修养工夫合一。现对张载论学(修养工夫)之内容作择要分析。

张载认为,为学的目的就是能够成为圣人,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。在《正蒙·诚明篇》中,他说:“儒者则因明致诚,因诚致明,故天人合一,致学而可以成圣,得天而未始遗人。易所谓不遗不流不过者也。”他将不追求为圣人看做为学、修养工夫方面的“大弊”,“告以知礼成性变化气质之道,学必如圣人而后已。以为知人而不知天,求为贤人而不求为圣人,此秦、汉以来学者大弊也。”由此,如何成圣成为了张载关注的重点。“心”则是修养工夫的重要概念,是张载哲学体系的重要环节:“由太虚有天之名;由气化有道之名;合虚与气有性之名;合性与知觉有心之名。”(《太和篇》)“天”、“道”、“性”、“心”构成了张载哲学架构的核心范畴,“天”与“道”承接天,“性”与“心”连接人,充分体现了张载天道与人道合一的态度。心为耳目见闻所累,如要尽心必要

知道何谓心。“人病其以耳目见闻累其心而不务尽其心,故思尽其心者,必知心所从来而后能”,“合性与知觉,有心之名。”(《太和篇》)由这句话看,心是“性”与“知觉”相合的产物。这里的“性”是张载所说的“天命之性”。“心”与“性”的关系就在于,只有受到具有主动性、能动性的“心”的支配,“性”才能得以充分发挥和实现,即“心能尽性,人能弘道”,而“心”对“性”的主动性的把握则通过“穷理”得以完成。“心”自觉体认主体的内在根据,充分发挥、扩充并实现天道,以实现“性与天道合一存乎诚”的圣人境界。“心”受闻见之桎梏,与贯通虚实内外“有无一”的天命之“性”相比,则小得多,“心”小“性”大,在“穷理尽性以成圣”的路上,只有“心”是不够的。为此,张载提出了“知”,包括“闻见所知”、“德性所知”和“诚明所知”。“闻见所知”是由耳目感官直接接触外物而得,是“徇象”,其后果就是心之本意被见闻桎梏,不能进一步“穷理”,也无法“尽性”,即是“徇象以丧心”。而“世人心,多止于见闻之狭”(《大心篇》),因此不能尽心、知性、知天。若想穷理尽性则必须“大其心”,去除“我”之私以体天下之物,圣人能够尽性,所以能视天下无一物非我,“大其心,则能体天下之物,物有未体,则心为有外”(《大心篇》)。孟子所讲“尽心”、“知性”、“知天”就是此意。“德性所知”与“闻见所知”不同,“见闻之知,乃物交而知”,“德性所知”则“不萌于见闻”。这样,张载的“知”便从单纯的认识论上升到了德性修养的层面上。“德性所知”是“知合内外于耳目之外”,是以待穷之理为道德基础,通过理性思维而得的“知”,这种“知”能够突破见闻小知的局限性,即物穷理,因此“其知也过人远矣”。“德性所知”虽然高于“闻见所知”,但并非圣人的认知方式,自然也不是认知的终点。与圣人之知相比,“德性所知”是有知,“有知乃德性之知也。吾曹于穷神知化之事,不能丝发”(《经学理窟·学大原下》),即使有知,便亦有所不知。而圣人之知则表现为无知,即无不知而不知,也就是“诚明所知”,由问而知。张载认为“诚明所知乃天德良知”,可见“诚明所知”是穷理尽性、穷神知化之后的“知”,不需要“思虑勉强”,是通过理性思维和道德修养而得到的德性所知,它不需思虑,不虑而知,不学而能。这是圣人本性中所固有的,也是学者修养工夫的目标指向,如能抛却“德性所知”而达到“诚明所知”,自然也就从大人阶段进入了圣人境界。

从字面来看,《东铭》提及最多的是“言”、

“动”,貌似与张载心性知的修养工夫关系不大,其实不然。冉觐祖曰:“夫达德首知,知之用非一段,而切莫于言、动。言、动各得其当,斯称知矣。”^{[2](P967)}察人之所知需听其言观其行,知通过言、行具体表现出来,只有言、行得当,非礼勿言、非礼勿动,才是真知,真知是智,由智则可以成仁,即达德首在于知。在张载看来,出“戏言戏动”之心,并没有实现心之本然,不是人心所固有,更不是诚心,而“过言过动”则是受耳目见闻小知所累、不加思索所造成的一时不察之失。学者不能认识由不正之心所出的“戏谑”和被耳目见闻所累的“失误”,不加省察改过,必将流于“长傲遂非”,不能体天下之物而“明”,从而阻碍其成圣之路。由此,张载提出于“言”、“动”小处下工夫,抛弃闻见小知之累,正心诚意,以实现“诚明所知”的圣人境界。如李光地所言“持重而无戏言、戏动者,主敬之事也;改过而无过言、过动者,徙义之事也。长傲则不敬,遂非则害义,不敬、无义则初学之本失”^{[2](P968)},体现了张载“工夫之谨密处言人道”的修养方法和严密谨慎的学风。

此外,《东铭》还与《乾称篇》首章的《西铭》相互呼应,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天道与人道合一的哲学体系。张棠、周芳所撰的《正蒙注》就认为《乾称》“篇首冠以《西铭》,言理一分殊,中间极论神化、性命、天人、死生之理,要归于存诚进德。而终之以此,此初学之门也,学者能致谨于此则可以寡过。亲贤而进于德,德立则可以自益、益人而几于诚。诚然后可以穷神知化、尽性至命而尽。此理一分殊之则,乃《正蒙》全书之要”^{[2](P969)}。张载是否以“理一分殊”论《西铭》可另当别论,仅就内容来看,《西铭》与《东铭》一广阔宏大、一谨微严毅,一论天道之高远、一论人道之谨敬,思想相通,意蕴相合,是《正蒙》之要,也是张载思想之要,而并非朱子所说的“于下学工夫盖犹有未尽”。

可见《东铭》之精妙就在于其切实工夫。正如刘宗周所言,“张子精言心学也”,“《西铭》之道,天道也;《东铭》,其尽人者与”!^[4]

三、《东铭》在张载学术体系及哲学史上的地位

以上我们对《东铭》的真实意蕴作了探讨,并且分析了《东铭》与张载修养工夫的关联性。笔者认为,《东铭》从“言”、“动”处入手,要求学者正心诚意,主敬持重,改过迁善,做到这些,便可以亲贤进

德,自益、益人而进诚。所以《东铭》一文虽然在气象上不及《西铭》宏大,所论内容不及《西铭》丰富,但确是学者进学成德的必由之路,“释君子之所以动天地、感人鬼者,惟诚于言行耳”^{[2](P966)},值得学者重视。

明中期以后《东铭》逐渐被重视,学术地位有了一定提高。学者所编的各类《正蒙》注解对《东铭》多有提及,在一些学者眼中《东铭》甚至较之于《西铭》更为重要。如韩邦奇就认为《西铭》规模阔大,《东铭》工夫缜密,为学要先于缜密处下工夫才可宏大气象,即“先《东》后《西》,由人道而天道可造矣”,朱子独尊《西铭》,有失于道德工夫,“失横渠之旨矣”!^{[2](P966)}顾泾凡也表达了对朱子忽视《东铭》的不满,“抑此书因程门单提《西铭》,朱子从而表章,遂将《东铭》混过。愚熟玩之,《西铭》是个极宏阔的体段,故推至于知化穷神;《东铭》是个极详密的工夫,故严覆于戏言戏动。孟子论仁义之充纤而及无受尔,汝可言未可言之间意。盖如此质美者,明得尽渣滓,便浑化却与天地同体。其次需在一言一动上仔细磨勘,方可渐入。若无《东铭》工夫,骤而语之以《西铭》体段,鲜不穷大而失其居矣。敢以此附两君子之后,求就正焉。”^{[2](P982)}顾泾凡认为《东铭》是在严密处下工夫,在一言一行上仔细琢磨方有所得,方可下学上达,若没有此琢磨的工夫,只是向心于《西铭》的宏大之意,就会失去安身立命之本。清儒如李光地在其《注解正蒙》中也表达了对《东铭》的重视。出现此种情况的原因,就在于晚明空疏学风盛行,学者侈谈心性,多讲大话。《宋元学案补遗》所录刘畿山语:“千古而下埋没却《东铭》,今特为表而出之,止缘儒者专喜讲大话也。余尝谓《东铭》远胜《西铭》,闻者愕然。”^[3]《东铭》所言的微小工夫则体现出了儒家重视道德实践的特点,是对空疏学风的批判。

《东铭》被重视的原因不能仅仅归于时代学风的变化,更重要的在于《东铭》自身的价值。

首先,《东铭》充分体现了张载躬行实践的精神特质。张载及其关学注重实践,其“实”不仅表现在他在宇宙论中对“气”的重视,还体现在他的工夫论层面。如《明儒学案·师说》在概括关学特征时说“关学世所渊源,皆以躬行礼教为本。”张载提倡“学贵有用”,他在横渠镇对井田制的试验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。《东铭》主张工夫从细微着手,于日常生活言行之中琢磨己心之不正,努力实践人道以达天道,而不是大而化之地空谈修养。

其次,《东铭》充分展示了张载及其关学重礼的学术特点。“知礼成性”是张载学术的独特之处。吕大临《横渠先生行状》中说:“学者有问,多告以知礼成性变化气质之道,学必如圣人而后已,闻者莫不动心有进。”^{[1](P383)}《宋史·张载传》也有此记载:“与诸生讲学,每告以知礼成性,变化气质之道,学必如圣人而后已。”又有司马光、二程、朱熹、冯从吾、王夫之等都对张载“知礼成性”有所论述,可见,“礼”是张载及其关学的重要特点。《东铭》中虽未明确提及“礼”,但其所包含的“重礼”内涵不可忽视。不论是戏言戏动还是过言过动,都是不当的言行,需要加以改正,去轻浮而持重,改过失而徙义,无一不是遵照君子之“礼”而行,做到了“非礼勿言,非礼勿动”,自然心正意诚,主敬持重。可见,《东铭》改过的标准就是“礼”。

再次,《东铭》是张载“天人合一”学术体系不可或缺的一环,在《正蒙》篇中与《西铭》首尾呼应,一说广阔宏大,一论谨慎严密,共同构成了张载学术下学而上达,由明以至诚的成圣之路。“天人合一”是儒家的一贯主张,张载以“天”、“道”、“性”、“心”方式构建其学术体系,更是体现了其天道与人道合一的观点。《东铭》作为“初学入门”,是尽性的起点,《西铭》作为“仁之体”,是圣贤之气象;《东铭》矻不知之愚,《西铭》订“痿痺不仁之顽”,知与仁相合,便是圣人之道,便可天人合一。

总之,《东铭》论“言”、“动”,主张于“言”、“动”微小处做出切实工夫,敦促学者省察不正之心,迁善改过,仔细琢磨一言一行,以正立身之本。本立而亲贤,亲贤而进德,而后益己益人以至于诚。可见《东铭》所言是为学工夫的重要组成部分,应当引起学者的重视,并将其内化于心以自省。本文虽然认为古今论者多重视《西铭》、轻视《东铭》的现象不利于深察张载思想之本意,但并没有无限抬高《东铭》的意图,也不认为《东铭》应该凌驾于《西铭》之上,而是认为要将二铭联系起来,才能更好地把握张载“天人合一”的哲学意蕴。

[参 考 文 献]

- [1] 张载. 张载集[M]. 北京:中华书局,2010.
- [2] 林乐昌. 正蒙合集集释[M]. 北京:中华书局,2012.
- [3] 王梓材,冯云濠. 宋元学案补遗[M]. 北京:中华书局,2012:1134.
- [4] 黄宗羲. 宋元学案[M]. 北京:中华书局,2009:668.